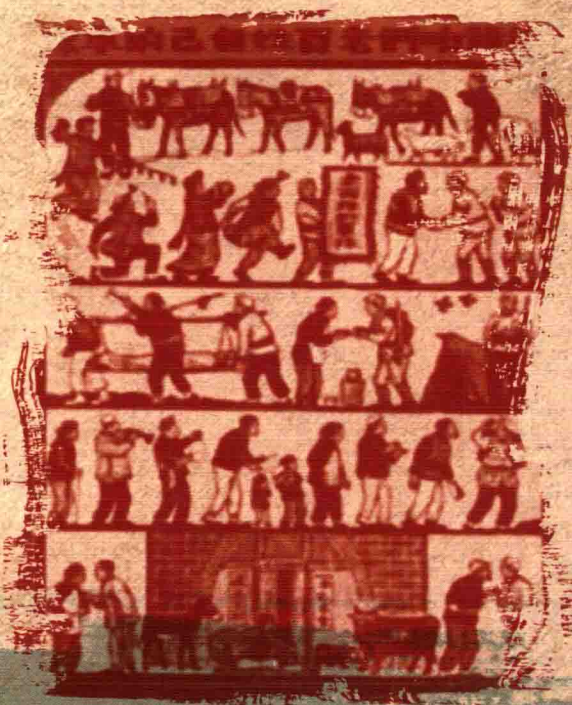


过年

华北根据地的民俗改造

(1937—1949)

李军全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过年

华北根据地的民俗改造

(1937—1949)

李军全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过年：华北根据地的民俗改造：1937—1949 / 李军全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10

ISBN 978 - 7 - 5203 - 2404 - 5

I. ①过… II. ①李… III. ①革命根据地—风俗习惯—研究—华北地区—1937—1949 IV. ①K892.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85161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吴丽平
责任校对 王佳玉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25
插 页 2
字 数 278 千字
定 价 7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8YJC770013）阶段性成果
扬州大学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序一 用历史的眼光看待民俗变革

军全的学术新著《过年：华北根据地的民俗改造（1937—1949）》将要出版，嘱我为其写几句以为序言。在这个研究领域中，军全已是小有名气的专家了，因而序言不敢当，写几句读后感以致贺。

几年前，军全从南开大学博士毕业，然后有机会进入近代史研究所跟我从事研究工作。在这之前我并没有见过军全，在所里组织的面试会上，他的表现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自然也就脱颖而出，才有了难得的相处时光。这一段时光，我们相处得十分愉快，作为一个合作者，说实在的，我从军全那儿学到了不少。

军全从事中共根据地节庆研究已经很多年了，也写作发表了不少论文。在这个领域，他的研究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和成就，所以在研究刚开始时，我建议他趁着年轻应该开辟更多的领域，趁着年轻多读史料。当然已有的研究，应该尽早有个阶段性的清理，不然的话，新的领域开辟了，旧的领域可能很难再提起足够的兴致，曾经有过思考的课题完全丢弃也实在可惜。这本新著，就属于军全的过去式，我一方面期待他新研究领域的进展，另一方面对于过往研究的整理也一直很期待。

通读这部书稿，一个很直观的感受，是资料丰富，而且有很多新的拓展。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富矿。俗谚说历史是胜利者写的，这当然可以做多种解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解读，就是胜利者有机会、有力量、有可能保存自己更多的历史记录，尽管这些记录也一样要通过历史学家审慎的鉴别。基于如此丰富的史料，作者尝试揭示民族战争背景下华北根据地“过年”时刻的民风民俗，并从政治文化的视角观察这些有意识引导的民俗变革对



于中国共产党革命最后胜利的意义。有的看法还具有一定的新意，给人启发良多。

从学术史的观点看，中国共产党对旧传统的改造力度大、影响深远，但是如何理解这项移风易俗的社会工程，海内外相关研究者见仁见智。其实，如果从大历史看，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民俗的改造也是中国历史大转型的必然环节之一，这是中国从农业文明走出，重建现代民族国家，重建现代文明过程中一个无法绕开的思路。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可能显得太过于政治正确了，也不甚合乎刚刚从传统的农业文明走出来的中国，不过，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国过往基于农业社会的熟人社会、旧民俗一定会被新的民俗所替代，这个方向大约不必怀疑。甲午之后，中国人意识到这是三千年或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中国旧俗的改革、调适，已在进行，处于特殊国情中的中国共产党接续了这个趋势，当然在变革的方向上也与此前很不一样，注入了许多革命的、政治化的因素。

从中央苏区至延安的陕甘边区、华北根据地，以及其他根据地，都是中国共产党建政前的政治实践，这是共和国的“前史”，是为“正史”所做的准备。后世研究者如欲正确、深刻理解共和国历史的真相、问题与意义，必须回到前史，从前史的细枝末节寻找解读的可能。军全的这项研究，也在试图证明1949年之后中国在社会改造方面的一系列举措有着历史的依据与凭借。建政前中国共产党所建构的新民俗，从今天的观点看或许问题多多，但在当时以及后来的政治动员、社会动员方面，必须承认，中国共产党的这些做法确实具有相当的吸引力。过去读黄炎培、梁漱溟、范长江等对延安以及其他中国共产党控制区域的考察文字，就感到中国共产党主导重建的新民俗确实具有相当大的魔力，那么多仁人志士能被延安、根据地的发展事实所折服，不能全部归因于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或许应该从新民俗的发生、发展这一事实本身寻找原因，历史主义地看待中国共产党民俗变革尝试的意义。

军全的研究之路刚刚开始，相信他的勤奋、善学，在未来的研究中一定会获得更多好成绩。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学术是最诚实的事业，一分努力就有一分收获，选准方向，只要坚持下去，方法对路，就

一定不会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衷心期待军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不断奉献有思想力度的学术佳作。

是为序。

马 勇

2018年4月3日于北京

序二 回到历史场景的思考才有意义

军全将他的书稿给我，请我写序，特意说明他在选择这个题目时受到我曾给予的启发和指导，竟影响了他此后十年的研究方向。回想往事，历历在目，如在昨天。

军全本非我指导的学生，当时在天津师范大学读硕士研究生，因他女朋友曾跟随我攻读硕士学位的缘故，得以与我认识。他时常来南开蹭课，有时找我聊天。当时他对中共党史的研究极感兴趣，想对旧有研究框架有所突破，力求新意。在课余聊天中，我提出请他尝试把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作为研究方向，并受日本学者丸田孝志教授的启发，让他试着从中国共产党各级政权通过习俗改造传播革命的意识形态进而动员民众的视角切入，来考察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动员广大民众参与抗战与革命中的。他听后极为兴奋，回去后与其导师李学智教授商议，李教授并没有因他与我接触而有所不悦，反而鼓励他沿此思路进行思考，并嘱咐他尽可能选择一块根据地作为研究对象。此后，军全经过对史料的反复阅读与思考，拿出了自己的思路和写作大纲，在我主持的读书会上，师生对此展开了激烈辩论，极大启发了军全的思路，其后他顺利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

2009年，军全顺利考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攻读博士生，师从张利民教授。由于张教授本身就职于天津社科院历史所，系兼职博导，来南开上课时间有限，军全在三年间一直参加我主持的每周“江门读书会”。我见证了他三年间的不懈努力，为阅读资料，他常常假期泡在图书馆、学院资料中心；为提升理论水平，他购买了专题性的理论著作进行阅读，也常常在我的读书会上报告，接受大家批评。他的研究方向十



分固定，一直以文化史的角度解读抗战时期中共党史，在一些阶段性研究论文的写作中，逐步形成了较系统的看法。我带他参加过几次国内及国际学术会议，其报告在引起争议的同时也获得好评，他的学术思维逐渐成熟，学术研究的自信也渐渐积累起来。

博士毕业后，军全分配到淮北师范大学执教，走上了高校教师的道路。他依然在自己选择的研究方向上持续深入，陆续写出了一些有相当影响的论文，有的还被人大复印报刊中心出版的《中国现代史》全文转载。不久，他有幸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继续深造，合作导师是近代史名家马勇研究员。经与导师商议，他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选定了华北中共根据地春节文化为出站报告的主题，即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的初稿。可以说，这是军全在战时中共革命文化研究上累积十年功力的成果。

所以在序言中对军全的研究经历进行简述，意在强调在初入学术道路之时，经认真选择后要坚持既定方向，积少成多，聚沙成塔，功到自然成的道理，或可为青年学生初入学术道路时有所借鉴。

论及此书的创新之处及学术价值，个人觉得有三：

一、关注中国共产党革命与传统习俗间的辩证关系，不是只从革命自上而下改造习俗的单向视角切入，同时也有习俗制约革命宣传的自下而上的视角，真正形成了历史分析的双向互动。

以往有关抗战和国共内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动员民众的研究，多侧重于经济施惠（如减租减息等）、民族主义号召、揭露日伪统治残酷、批评国民党统治重大弊端及政治宣传等，这些研究思路可以说都触及历史的真相，也触及农民动员中的重要方面，是极有价值的。然而问题是，这些研究多不自觉地将中国共产党置于政治、文化的高端，置广大农民于被动或不自觉的低端，形成了一种内在的自上而下的视角，中国共产党的动员机制被描述成为一种系统的完整的政治过程，中国共产党对传统乡村习俗是完全主动的掌控，农民群体则是完全的被动接受，根本不具有任何的主观能动性，几千年来基于农业生产、生活方式上的传统习俗所具有的韧性，顷刻间在革命浪潮前土崩瓦解，革命形成了一种碾压式的冲击。证诸史料，我们会发现，在华北中共各根据地基层政权对农民的动员工作中，存在着诸多利益的博弈，农民的中共认同感、民族一

国家意识的渐成，都有一个逐步发展的成长过程。不少地区抗战初期中共初到时，甚至存在着农民不认同中国共产党政策，或接受了经济利益却不接受中国共产党参军、参战动员的情况，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复杂性令人深有感触。军全对史料的梳理中并没有无视相关材料，而是打破思维的限制，体现出了革命与习俗的双向互动，习俗的韧性与农民利益及惰性，这些情况在齐小林的《当兵》、岳谦厚的《边区的革命》中屡有提及，这种开阔的视野对改变中共党史研究的史观具有重要的价值。显然，如果我们不正视农民利益、乡村文化的韧性，不仅对传统文化的产生及变革的深层次根源是模糊的，对于中国革命的艰苦性及复杂性也存在着想当然的浮浅，某种程度上也降低了对中国共产党胜利的巨大历史意义及价值的深刻体会。

二、革命不能只是高高在上的强制性灌输，必须放下身段去适应乡村文化的层次，这种力求让政治社会化的努力，让农民在喜闻乐见的表达形式中潜移默化地入脑入心，产生了积极的效果，或许这才是毛泽东一再强调“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要求知识分子贴近工农的真谛所在。由延安倡导的文艺改造，背后是如何服务中国共产党扩大力量、战胜日伪并夺取政权的政治需求，此时文艺即是政治。这种思考是一种真正回到历史场景的求实，而不是仅从理论导出的不着边际的想象。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迅速壮大，源于广大农民的参军及广泛支持，这是革命胜利的根本保障。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及民族主义的宣传，于其中发挥了巨大的号召力。问题是，国民党何以无能动员农民，中国共产党何以掀起了安土重迁、疏离庙堂的农民的心底波澜？

此书清晰地分析了春节在秋收冬藏、春播夏耕间的休闲功能，对于劳作一年的农民而言，长达15天的春节期间，有传统性的戏剧、花会、庙会表演，是最集中展示乡村文化、释放情感、寄托新年希望的时间段，其所具有的祈福、团聚、休闲意义，对于乡村社区意义重大。致力于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进行传播中各根据地各级政权，在春节期间展开的文艺宣传中巧妙利用年画、秧歌、戏剧、壁画、标语等形式尽力贴近农民，此书对此进行了细致考察，也注意到了各地按要求展开的拥军优抚工作的慰藉作用，更是对一些地区开展的控诉活动进行了分析。作者强调，这些活动从正反两面逐步扭转了村庄的政治气氛，也在广大农



民长期浸淫其中的家庭、家族意识里，逐渐注入了近代民族—国家意识，彻底切断了抗战时期撤离华北、本就政令难下乡的国民党政权与乡村的政治关联。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信息环境中，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在反复传播中渐渐占据主导。不仅中国共产党通过“减租减息”政策让农民获得经济实惠，更通过压迫地富、民主选举、“三三制”等措施，让千百年来根本不具有政治地位的贫苦农民，有了当家作主、读书受教育、管理乡村的可能性，生存尊严的获得，政治地位的提高，是足以改变广大农民的政治取向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基层本地干部的自然属性，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意识形态融入乡村文化，也使自己成为传统文化的政治代言人，与农民产生了天然的亲近感。美国学者裴宜理将这种方式称之为“文化置位”或“文化操控”^①，理解或许有误。质言之，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核心理念产生于这块土地上，但在苏俄革命影响下逐步接受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形态，核心理念与理论形态间的内在张力，本身即需要一个整合的过程，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过程，问题在于理论只是具有指导意义，现实则需要贴近传统、靠近农民。中国革命文化的主体是浓重的传统要素，在当时根本没有“文化置位”的可能性。以当时中国共产党基层干部的个人素质，其所能理解的革命文化与其所选择的传播方式，只能是“新瓶装旧酒”的形式；因此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的宣传，在特定的环境下也不可能脱离广大农民最为熟悉的传播方式，传统与现代因素在此浑然一体，难以区别，更有利于农民对于革命文化的逐步接受和理解。在残酷的抗战中，广大农民在救亡声中也获得了启智开蒙的历史性机遇，领导这一文化转型的是最熟悉农民思维的中共，试想，广大农民为何不跟着中共走呢？

三、革命对民俗的改造及利用具有两面性。第一，消除民俗中的落后特性，提升民众的文化层次；第二，为达到动员目的，革命自觉不自觉地也接受了民俗的改造，如个人崇拜的倡导。这些认识源于对传统华北乡村文化实态的清醒理解，也源于对中共政治文化演进进程的思考。

在抗战时期的华北乡村，有武力支撑、又有民族主义思潮正当性为

^① 参阅《红色文化与中国革命传统——于建嵘、裴宜理对话》，《南方周末》2011年6月16日；[美]裴宜理：《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阎小骏译，香港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基础的革命意识形态，同时也以现代文化为主调，极其强势。中国共产党希望通过意识形态的传播，将农民从个体农业生产、狭隘的乡村意识中解放出来，不仅支持抗战和革命，而且也要具有建立新中国、解放全世界的宏大理想与雄心。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强力传播其意识形态的同时，也在努力传输一些科学知识和文明娱乐等观念，以改造传统乡村文化中一些明显不合时宜的成分，如迷信、赌博、嫖娼、买卖婚姻、“好男不当兵”等观念，甚至为此采取强制性措施。但各根据地乡村干部多出自本地，知识及视野有限，工作方法有限，对文化改造的认识多出自自己的理解，甚至对传统采取“新瓶装旧酒”的方式加以改造，以出乎所料的速度传播，如将反对“封建迷信”的拜神，改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后，因其适应农民的传统认知，在宣传方面反成了凝聚中共政治认同的有效手段^①，遂无人再追溯其原有本质。此时，强势的革命意识形态，被乡村传统顽强地融入并打下印记，追求超越时代的革命意识形态，终究还是未能超越传统的约束。革命的复杂性及艰苦性，于此可见一斑。有形的革命可能是政权易手，但革命异变无形的文化生态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哪有摧枯拉朽、天翻地覆、沧海桑田？

读完书稿，掩卷长思。我觉得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的强制性输入及改造，从革命动员的角度而言是成功的，但它并没有切断传统民俗的根脉，这是一个渐进且纠缠、博弈的复杂过程。

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本身既是一个有相对明确方向，又是一个多种因素交织的复杂的演进路线，描述出一个发展的主线，阐明近代中国革命的根本走向，相对简单，但如何将主线发展背景下的“历史复杂性”写出来，让人真正体会到历史的发展并不是什么动力或思想主导下的预定版本，而是经历无数艰难、困苦、曲折而来的，才会让人真正体会到历史发展的澎湃动力、曲折艰难和光明未来间的辩证关系，才会真正从中受益，体会到中国革命胜利的艰苦性，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如何从弱到强、如何赢得民众拥护、建立政治认同的卓越才能的成长过程，以及走向革命胜利的必然性，避免“小兵张嘎”式的儿童化思维和抗日神剧式的浪漫想象。因此，中国革命历史的描述有内在的必然

^① 薛云：《华北解放区春节敬奉毛泽东现象述论》，《历史教学》（高校版）2010年第7期。



性，但不应该描述成一个完全性的体系化进程。

此书在整体思路上，也难免带有目前中共党史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解释历史事件过于条理化、体系化的问题。如在讨论中共各级党组织对利用春节习俗进行政治文化的渗透及宣传时，将一些文件、报告的要求罗列成一套体系化的方案，构建成了体系化的宣传手法及活动路径。各根据地的政治宣传，真的均有“较为严密的政治设计”吗？所举事例有无以点带面之嫌？考虑到抗战时期中共党组织发展自身的局限性、以农民为主体的党员群体在知识及视野上的局限性，考虑到广大农民较为低下的文化及国家意识，即使在中共上层存在着意识形态宣传的体系化政策，广大基层干部也十分用力，但在广大偏远山区、乡村的执行中，春节习俗中逐步反映出了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因素，也起到了动员农民的效果，却难以迅速建构起体系化的实施途径和方案。谈及中国共产党对以春节为代表的节日文化的改造，旨在建构乡村新秩序的宏大构想，本身似乎即有建构之嫌。就此而言，仍需要客观思考。回到历史场景的思考才真正具有意义和启示。

此书找到了一个理解中国特色革命的视角，对中国革命与传统文化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客观而深入的思考，将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向前大大推动了一步，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以后如能展开视野，对抗战时期国统区、沦陷区的春节形态进行比较分析，或许更能看出春节这一文化载体在战时三种政治力量争夺中的艰难演变及其顽强韧性。与之相关的一个延展性话题则是，近代以来无数政治家、学者都在思考中国乡村的经济与文化改造，但何以多有言论难有实招，乡村改造的失败原因何在？它需要什么条件？这实际上是一个可以鸟瞰 20 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核心问题。

拉杂几句，权为推介，祈望方家教正。

江 沛

2017年6月1日于南开大学津南校区历史学院

目 录

绪论	(1)
一 问题缘起及意义	(1)
二 学术研究现状	(4)
三 研究思路和方法	(14)
四 概念界定	(15)
第一章 遭遇：革命的发生	(17)
第一节 社会生态：春节的土壤	(17)
第二节 民俗心理：春节的实质	(25)
第三节 战争环境：革命与春节的结合	(33)
第二章 宣传：革命的号召	(45)
第一节 宣传要点	(45)
第二节 宣传路径	(54)
第三节 宣传监管	(64)
第三章 优抗：革命的慰藉	(79)
第一节 “团圆”：慰藉基础	(79)
第二节 物质和精神：双重慰藉	(83)
第四章 文娱：革命的移植	(99)
第一节 年画的改造	(99)



第二节	秧歌的复兴	(115)
第三节	戏剧的发明	(131)
第五章	因应：民俗的革命	(152)
第一节	火热的宣传	(152)
第二节	政治的感恩	(167)
第三节	革命的狂欢	(185)
第四节	嬗变的年俗	(195)
第六章	纠缠：民俗的韧性	(213)
第一节	拜神的观念	(213)
第二节	赌博的习性	(217)
第三节	演戏的顽疾	(225)
结语	(235)
一	华北根据地春节文化特征	(236)
二	民俗的革命价值	(239)
三	革命能否超越民俗	(246)
参考文献	(252)
致谢	(275)

绪 论

革命并非天生的，而是现代化的产儿。作为一个政治术语，它始于17世纪，由最初的反动隐喻渐被赋予开辟新道路的前进意义，美国学者塞缪尔·P. 亨廷顿认为：“革命”就是对一个社会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神话，以及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一场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国内变革。^① 确是如此，回望世界近世文明，革命无可回避。发生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共革命自是世界革命潮流中的一朵大浪花，虽然悄然远去，但是其带给中国乃至世界的深远影响并未消散，现在探寻这场革命中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理想、经济建设、社会结构和民众观念等层面的诸多实践，发掘革命发生的原初环境，从中抽取智慧和教训，这或许是一件充满趣味和价值的话题，抑或是一种真正理解“革命”意义的态度。

一 问题缘起及意义

坦率而言，对中共革命的兴趣初始于影视作品的文艺表达，内中对共产党、八路军英勇无畏、敢于牺牲形象的塑造，尤其是抗战题材作品对华北根据地军民一体形象的刻画，常常感染我。随着学术研究道路的开启与深入，查阅到的有关中共革命的资料和论著越来越多，笔者逐渐被中国共产党那种广阔的革命胸怀和顽强的生命力所折服，经常抚卷深思：“中共屡陷险境，却总是化险为夷，走出困境，内中的奥妙何在呢？”这时候，曾经亲历中共华北战场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

^① [美] 塞缪尔·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4年版，第220页。



朗描述的关于抗战期中共成长的经历给予了灵感，她言道：“当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共产党只占据着西北一小块贫瘠的地区，面积大约三万三千平方英里，人口一百五十万，首府是延安。战争结束时，他们已经拥有八十多万平方英里的地区，人口一亿四千万。他们的地区扩大了二十倍，人口增加了将近一百倍。”^① 姑且不论斯特朗所列数字是否确切，只言对于中共来说，抗战期真的不是一个小的装扮，完全是一个超级的华丽转身。为何呢？此时影视作品中关于根据地军民“鱼水情”的景象似乎提供了答案，即农民的广泛参与是中共革命成功的基点，倘若没有农民的支持和参加，中共很可能不会越过重重围栅，从而以暴烈的武装方式层层推进，涤荡全中国。然而，革命的成本是高昂的，战争的危险又是令人生畏的，先天精明的农民为何愿意舍弃风险支持中共呢？或者说，中共是如何使农民舍弃风险的呢？这个问题成为笔者尝试揭示中共革命为何成功的动力所在。

诚然，这个问题不仅使笔者痴迷，还让海内外学者流连忘返，众多知名学者对此都有所论及，因而学界提供的解释和争论不胜枚举。李金铮细致地梳理了迄今海内外学者对此问题的答案，总结成四个方面：“一是土地集中、家庭贫困与农民革命的关系；二是社会经济改革与农民革命的关系；三是民族主义与农民革命的关系；四是中共动员与农民革命的关系”^②，认为每个方面揭示出中共革命的一个面相，有其合理性，但是倘若要探寻中共革命胜利原因，仍是以还原农民的革命动机为研究使命。换言之，这其实是警示我们要努力回到革命发生的现场，揭示出革命的复杂性。如果从革命的本质方面进行理解，这便是一个努力发掘中共革命传统性的问题，因为革命本是实现现代化的武器，是建立新秩序的准备，有的革命可能发生于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里，实现现代化的任务较为单纯，但是有的革命也会产生在一个传统性的社会里，这意味着革命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传统阻力的强弱，历史已然证明，革命的成功突围往往会借助传统产生力量，即使是发生于现代文明的革命也难以避免自身的传统性。大多数时间

^① [美]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中国人征服中国》，刘维宁等译，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61页。

^② 详见李金铮《农民何以支持与参加中共革命？》，《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